专家视点

邓小平谈话讲的六条准则

□倪德刚

1989年5月31日，在征得陈云、李先念同意后，邓小平找李鹏、姚依林进行了一次长谈。这次谈话的核心内容是中央领导人和中央领导集体怎样才能干好。邓小平讲了以下六条准则。

“眼界要非常宽阔，胸襟要非常宽阔，这是最根本的要求。”党的领导人的眼界和胸怀决定党的事业成败。邓小平总结历史说：我们的第一代领导人前期是胸襟宽阔的，我们第二代基本上也是胸襟宽阔的，对第三代领导以及以后的领导都应该有这样的要求。邓小平指出：“要从大局看问题，放眼世界，放眼未来，也放眼当前，放眼一切方面。”他强调：“新的领导机构，眼界要非常宽阔，胸襟要非常宽阔，这是对我们第三代领导人最根本的要求。”

邓小平讲的眼界和胸怀，既是党的领导人和领导集体必备的政治素质，也是干好党的事业的根本要求。

“反腐败这个关必须过，对党内高层腐败下不了手，就会丧失人心，就会失败，这是大局，不管是谁，一律受惩罚，要公布于众。”对于反腐败的决心和措施，邓小平交待了以下几个要点：一是“我们是真正反腐败，不是假的。本来我们就是要反对腐败的。对腐败的现象我也很不满意啊！反对腐败，几年来我一直在讲，你们也多次听到我讲过，我还经常查我家里有没有违法乱纪的事。”二是“腐败的事情，一抓就能抓到重要的案件，就是我们往往下不了手。这就会丧失人心，使人们以为我们在包庇腐败。这个关我们必须过，要兑现。是一就是一，是二就是二，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一定要取信于民。”三是“腐败、贪污、受贿，抓一二十件，有的是省里的，有的是全国范围的。要雷厉风行地抓，要公布于众，要按照法律办事。该受惩罚的，不管是谁，一律受惩罚。”四是惩治腐败，要拿事实给人民看，这样人民的心里才会平静下来。不然就会今天一个上街，明天一个上街，“要看到这个大局”。他举例说：“这次出这样的乱子，其中一个原因，是由于腐败现象的滋生，使一部分群众对党和政府丧失了信心。”随后不久，邓小平再次强调：“对我们来说，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

邓小平讲的反腐败，既是党的领导人和领导集体立于不败之地的法宝，也是干好党的事业的有力武器。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能动摇，这是根本问题。”邓小平提出四项基本原则后，在这个原则问题上，他从来没有让过步，也从未放松过。说不让步，在这次谈话中，他指出：“领导要取信于民，要得到人民对这个集体的信任，使人民团结在一个他们所相信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周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不能动摇。这一点我任何时候都没有让过步。中国不搞四个坚持能行吗？人民民主专政能不用吗？坚持不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不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不坚持社会主义，坚持不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这是个根本问题。”

邓小平讲的四项基本原则，既是党的领导人和领导集体必须牢牢抓住的政治生命线，也是干好党的事业的根本保障。

“考虑任何问题都要着眼于长远，着眼于大局，小局必须服从大局，这是关键问题。”党的领导人和领导集体在改革开放大业进程中，肩负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历史重担，担承着振兴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干好和走好每一步必须胸怀全局，放眼未来。邓小平说：“我们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书记处的同志，都是管大事的人，考虑任何问题都要着眼于长远，着眼于大局。许多小局必须服从大局，关键是这个问题。”

邓小平讲的大局观念与战略眼光，既是党的领导人和领导集体应有的政治责任，也是干好党的事业的根本方法。

“决不能形成小派、小圈子，小圈子害死人，很多错误就从这里犯起。”邓小平在谈话中说，还有一个问题，党内无论如何不能形成小派、小圈子。我们这个党。严格地说来没有形成这一派或那一派。三十年在江西的时候，人家说我是毛派，本来没有那回事，没有什么毛派。能容忍各方面、团结各方面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邓小平讲了两个亲身的例子。第一个例子，他说，自我评论，我不是完人，也犯过很多错误，不是不犯错误的人，但是我问心无愧，其中一点就是从来不搞小圈子。第二例子，他说，过去我调任这样那样的工作，就是一个人，连勤务员都不带。所以，他指出：“小圈子那个东西害死人呐！很多失误就从这里出来，错误就从这里犯起。”

邓小平讲的团结，既是党的领导人和领导集体必须共同遵守的政治原则，也是干好党的事业的根本原则。

“领导这么个国家不容易呀！责任不同啊！进入中央最高层都不再是过去的自己，人都有缺点需要继续改进，对班子满意就行，关键在领导核心。”一个中央领导集体的历史地位高低和历史贡献的大小是具体的。决定“高低”和“大小”的要件是由领导成员、领导班子、领导核心构成的。邓小平积其一生政治智慧、倾其一生政治体会，对三个“要件”做出了明确的交待。

第一，关于中央领导班子成员。邓小平说：我们在座的人都有缺点，别人一样也有缺点。各有各的缺点，各有各的弱点。当然缺点有大有小，有多有少。“人都是有缺点的，进了班子后还可以继续改进。”进了班子后，怎样改进和提高呢？邓小平强调两点：一是进入中央最高层的每个成员，都不再是过去的自己，不再停留在过去的水平上，因为责任不同了。二是每个人从自身的角度，包括自己的作风等方面，都要有变化，要自觉地变化。因为，“领导这么个国家不容易呀！责任不同啊！”

第二，关于中央领导班子。邓小平指出：“人们对班子里的每个人都可能有这样那样的意见，但对整个集体表示满意就行了。”对领导班子满意而不是对领导班子每个成员满意，这是邓小平对中央领导班子的总要求。满意的标准是干出实绩。邓小平以第二代领导集体为例，他说：我们这个第二代，我算是个领班人，但我们还是一个集体。对我们这个集体，人民基本上是满意的，主要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路线，而且真正干出了实绩。

第三，关于中央领导核心。邓小平在谈话最后强调：“只要这个领导集体是团结的，坚持改革开放的，即使是平平稳稳地发展几十年，中国也会发生根本的变化。关键在领导核心。”

对于领导核心是关键，邓小平在这次谈话后不久，进一步明确提出：“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没有核心靠不住，邓小平讲两个史实：其一，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因为有毛主席作领导核心，“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把共产党打倒。其二，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因为有这个核心，即使发生了两个领导人的变动，都没有影响我们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始终是稳定的。所以，邓小平强调：“新的常委会从开始工作的第一天起，就要注意树立和维护这个集体和这个集体中的核心。只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有一个好的常委会，只要它是团结的，努力工作的，能够成为榜样的，就是在艰苦创业反对腐败方面成为榜样的，什么乱子出来都挡得住。”

邓小平讲的领导成员、领导集体、领导核心的义务和责任，既是党的领导人和领导集体必须共同遵循的政治准则，也是干好党的事业的根本准则。

邓小平最后明确讲：“我请你们把我的话带给将要在新的领导机构里面工作的每一个同志。这就算是我的政治交待。”邓小平关于中央领导班子怎样干好的政治交待集中体现在《邓小平文选》第3卷《组成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集体》一文中。

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李庆刚

今年7月7日，是中华民族全民族抗战爆发77周年。在这一重要时刻，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位于北京卢沟桥附近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同1000多名各界代表一起参加纪念仪式，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号召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大力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他的讲话，言简意赅，振聋发聩，充满了不忘历史、以史为鉴的忧患意识，体现出维护和平、实现民族复兴的责任担当。

中华民族不可侮。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为人类和平进步与正义事业做出了彪炳千秋的历史贡献。全民族抗战期间，中华民族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死伤人数达3500万，直接经济损失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多亿美元。中华民族英勇抗战的史实惊天地、泣鬼神；中华民族在抗战中表现出来的伟大抗战精神昭日月、铭青史。

抗战精神，是一种伟大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爱国主义精神在抗日战争中的锤炼和升华。这种精神，来自中华儿女内心深处对祖国的无比热爱，蕴含着中华儿女不畏强暴、不甘屈辱的自强精神，蕴含着中华儿女万众一心、和衷共济的团结精神，蕴含着中华儿女舍生忘死、前赴后继的牺牲精神，蕴含着中华儿女百折不挠、奋斗到底的坚韧精神。自强，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团结，就是“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牺牲，就是“临难勿苟免”“尽节用命，视死如归”；坚韧，就是“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南西北风。”正是凭着这种精神，中华民族最终战胜了强大残忍的日本侵略者，创造了以弱胜强的战争奇迹，洗雪了自鸦片战争以来百余年的民族耻辱；正是凭着这种精神，中华民族使日本侵略者陷入全民抗战的汪洋大海之中，使日本帝国主义征服中国、称霸世界的狂妄梦想最终破产；正是凭着这种精神，中华民族坚持抗战形成的中国战场，成为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对日作战的主战场，牵制和消耗了日本侵略者的大量军力，给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北非地中海战场、苏德战场、西欧战场以巨大支持；正是凭着这种精神，中华民族的长期抗战给美、英、苏等盟国以重大支持，为中国在战后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提升国际地位，打下了坚实基础。

铭记历史，珍惜和平。弘扬伟大抗战精神，目的是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惜和平、警示未来，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不移维护世界和平。但树欲静而风不止。时至今天，仍然有少数人无视铁的历史事实，无视在战争中牺牲的数以千万计的无辜生命，逆历史潮流而动，一再否认甚至美化侵略历史，破坏国际互信，制造地区紧张。对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和警惕。

勿忘昨天的苦难辉煌，无愧今天的使命担当，不负明天的伟大梦想，我们必须大力弘扬自强、团结、牺牲、坚韧的伟大抗战精神，不断增强团结一心的精神纽带、自强不息的精神动力，继续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奋勇前进，不断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成就告慰我们的前辈和英烈。

党的思想史

民主生活会制度的由来与发展

□熊自牧

民主生活会，是指党员在党组织内部以交流思想、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为主要形式的组织活动制度。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各级党组织都组织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和广大党员不为人际关系所累，敢于向好人主义说不，开展深入扎实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真正做到了红红脸、出出汗，从内心深处受到触动。回顾建党93年的历史，民主生活会制度作为党内生活的一项重要制度，是伴随着党内民主生活的扩大和党内民主观念的提升而逐步确立并完善起来的。

民主生活会制度萌芽于建党的第一个30年。建党初期，我们党虽然有“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但由于缺乏有效的实际经验，对党内民主生活尚未给予足够重视。大革命失败后，党开始关注党内民主生活问题，并逐渐探索出一些有效的做法，提出一些有益的思想。党中央到达陕北后，开始提倡民主的工作精神，并在党内开展民主生活教育。1937年5月，毛泽东指出，党内的民主是必要的。1938年10月，毛泽东强调，必须在党内施行有关民主生活的教育，使党懂得什么是民主生活，什么是民主制和集中制的关系，并如何实行民主集中制。1941年，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0周年，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其主要内容是加强组织纪律性、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领导干部必须参加党的组织生活，听取党员群众的批评、增强党性，等等，从此确立了党内民主是增强党性的重要原则。随着党内民主理论的不断深化，党内民主实践也在不断创新。1942年开始的延安整风运动，就积极倡导并践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党内民主生活方式，开始有了民主生活会的雏形。1945年，党的七大通过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提出，必须放手地扩大我们党内的民主生活，必须实行高度的党内民主。

民主生活会制度建立于建党的第二个30年。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作为执政党迫切需要健全党内民主，实现正规的民主生活。1955年，中组部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农村党的基层组织工作会议，提出要建立支部民主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生活。1956年，党的八大进一步强调坚持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加强对党的组织和党员的监督，发展党内民主，反对个人崇拜。八大通过的党章明确指出，党必须采取有效的办法发扬党内民主。在1962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指出：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邓小平在发言时指出，根据党章规定，人人要过支部生活。我们是不是可以把领导人的支部生活，放到党委会去，或者放到书记处去，或者放到常委会去。在党委会里面，应该有那么一段时间交交心，真正造成一个好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空气。邓小平提出的建立民主生活会制度的建议，得到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赞同。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明确要求：“各级党委或常委都应定期召开民主生活会，交流思想，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至此，民主生活会制度终于成为党内民主生活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

民主生活会制度完善于建党的第三个30年。改革开放以来，党内民主生活走上正轨，民主生活会制度真正得以落实并逐步完善。1981年8月，党的60岁生日刚过，中央组织部就印发《关于进一步健全县以上领导干部生活会的通知》，规定县级以上党委常委除了必须编入一个组织参加组织生活外，同时要坚持每半年开一次党委常委（党组）生活会。这是我们党第一次以党内文件的形式将民主生活会的时间、范围、内容、意义、目标等制度纳入领导干部的政治生活和组织生活。1990年，中央印发《关于县以上党和国家机关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的若干规定》，要求县以上党和国家机关党员领导干部的民主生活会，每半年召开一次，根据实际需要，也可以随时召开。1992年，党的十四大在新修订的《党章》中首次明确规定，党员领导干部必须参加民主生活会。从此，民主生活会制度作为党内民主制度的重要内容被载入党章，从而成为党员领导干部政治生活和组织生活中任何其他工作不可替代的重要组成部分。2000年，根据新的形势和任务，中央决定将县以上党和国家机关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由原来的一年召开两次改为一年召开一次。进入新世纪以来，党内民主生活会制度又有新的发展，特别是历次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召开的专题民主生活会，主题更加集中，批评和自我批评更加到位，会前谈心交心和广泛征求意见更加制度化，特别是民主生活会之后的情况通报、满意度测评等等，都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民主生活会制度。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民主生活会制度，民主生活会制度得到了新的发展和新的突破。201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习近平强调，中央政治局要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严肃性，提高领导班子解决自身矛盾和问题的能力。中央政治局内部，要倡导开展积极的、善意的、实事求是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大家坦诚相待、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总结经验教训，交流思想认识，达到帮助同志、增进团结、做好工作的目的。人们普遍认为，这次中央政治局专门会议用连续6个半天召开民主生活会，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为全党的群众路线民主生活会起了示范和带头作用。201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河北省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专题民主生活会，示范推动教育实践活动深入开展。党的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央政治局率先垂范，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积极参与，我们党的民主生活会制度开辟了一个新纪元。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话语体系转换

——从“革命”到“建设”的话语体系转换

□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

编者按：在不同发展阶段，由于时代条件的变迁和历史任务的转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构建出不同的话语体系。对此问题，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从三个方面进行了探讨：从“革命”到“建设”的话语体系转换；从“国家主导”到“国家——市场——社会”的话语体系转换；面向“中国问题”建构中国话语体系。本版自本期开始分三期刊出以上三大内容。

任何理论都会根据自身主题和理念构建出某种话语体系。我们需要探讨的问题是：在不同发展阶段，由于时代条件的变迁和历史任务的转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构建出不同的话语体系，从而使其在内容和形式上都体现出时代特色，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

首先，马克思主义具有革命话语和建设话语两种话语体系。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话语体系主要是由其主题和理念所规定的。“革命”与“建设”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两大主题。社会主义包括两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无产阶级要夺取政权，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实现政治和社会制度的改变，即“革命”。第二个阶段，无产阶级要消灭“整个旧社会生存的条件”，且经过一系列“环境和人都完全改变的进程”，从而实现无产阶级和整个人类的解放，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即所谓的“建设”或“发展”。围绕这两大主题，马克思主义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话语体系。一是革命话语体系。它以批判资本主义，尤其是批判市场经济下的资本逻辑为中心话语，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理论构成革命话语体系的主要内容。二是建设话语体系。它关注未来社会的建构，寻求更符合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社会形式以及实现它的现实途径。马克思把未来社会界定为“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只有通过长期的发展，特别是物质财富的积累，才能实现这样的社会理想。对于未来社会、对于共产主义的实践来说，马克思主义展现出的是建设性和建构性。当然，两大主题、两大话语体系不是分裂的，而是相互关联的。新社会的建构，是经过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历史时期之后实现的；无产阶级革命是要导向新社会的，每个人全面自由发展构成批判资本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的价值目标，生产力的发展与人的解放构成它们的历史任务。

其次，革命话语的中国化。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所谓“结合”，就是革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与当时的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这是由时代主题和历史任务决定的。以战争与革命为主题的时代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话语之实践提供了历史条件。自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的根本问题是“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解决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问题，只能靠革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是在中国化的革命话语指导下，中国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顺利地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随着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到来，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开始失去与新实践相结合的条件，应当根据新的实际和新的发展，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革命”到“建设”的话语体系的转换。可惜的是，在改革开放之前，这种转换没有真正顺利地进行过，人们多是停留在“革命话语”和“革命思维”之中，用革命思维去思考革命后的事情，用革命思维搞建设。

最后，建设话语的中国化。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党逐步实现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作重心的转移。这一点反映到理论上，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革命”到“建设”的话语体系转换。在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质上就是建设话语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代化实践相结合。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历史任务，为马克思主义的建设话语之展开提供了时代条件和发展动力。

习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与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这意味着，我们将社会主义的“建构性逻辑”与中国“现代性逻辑”有机结合起来了，形成了建设话语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其“理论主题”，是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中国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围绕这样的“主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然采取“建设”的话语体系，邓小平理论是其开创之作。邓小平十分强调解放思想。在某种意义上，他就是要将人们从革命话语的教条主义中解放出来，创造性运用“建设话语”。这一点特别体现在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解上。社会主义本质有两大维度。一是生产力维度，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革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强调，人类社会自阶级社会产生后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邓小平则强调生产力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基础地位，指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社会主义本质的首要因素。生产力优先性的确立，也为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奠定了基础。在革命话语体系中，由于对资本逻辑的批判，很容易导致人们对市场经济的批判。而在建设话语体系中，市场经济是有理论合法性的，因为它是现阶段中国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有效经济形式。二是公平正义和人的发展维度，强调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建构新社会形式的根本价值原则的“返本开新”。除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也立足于不同发展阶段，不断推进由“革命”到“建设”的话语体系转换：前者强调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型；后者强调从斗争思维到以人为本、和谐思维转变。此外，我们今天所讲的“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等，都是建设话语的集中体现。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立足于以“建设”为核心的话语体系，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思想资源。

（执笔人：唐爱军）

理论动态